变乱中的文明

——霸权终结与秩序重建

（公元1000年—2000年）

朱　宁　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前言……（1）
概论　文明与国际体系变革……（7）
引言、霸权的终结？……（8）
一、文明的地理整合……（19）
二、文明的政治秩序……（29）
三、国际体系之比较……（34）
四、文明的周期……（41）
五、国际体系的变革……（48）
六、变革与新秩序……（58）
第一部分　衰微中的多文明世界（1000—1453）　……（69）
第 1节　变化发生：大宋的下沉……（70）
第2节　变化发生：西方的上升……（84）
第 3节　边缘兴起与蒙古大陆霸权……（98）
第二部分　兴盛与衰落中的战争（1453—1648）……（107）
第 4节　第一技术推动：不同变化不同结果……（108）
第 5节　背向海洋：大明帝国的衰落……（122）
第 6节　宗教战争：欧洲的分裂、重组……（132）
第 7节　西班牙霸权及欧洲体系……（140）
第三部分　东西方力量对比变化（1648—1815）……（155）
第 8节　法英争雄及均势欧洲……（156）
第 9节　力量转移与美洲的兴起……（170）
第 10节　拜占庭精神在俄罗斯的复苏……（178）
第 11节　崩溃及重建：甲申三百五十年祭……（189）

第四部分　独秀而衰的西方文化（1815—1917）…… （199）
第 12节　变化世界中的大清盛世…… （200）
第 13节　日本挑战东亚秩序…… （214）
第 14节　战争与革命中的欧洲…… （227）
第五部分　未来秩序的多文明基础（1917—　）…… （243）
第 15节　战争与革命中的新世界…… （244）
第 16节　西方的没落：别了欧洲历史…… （250）
第 17节　殖民体系崩溃下的第三世界…… （259）
第 18节　苏联解体和美国全球霸权…… （265）
第 19节　德国统一和欧洲一体化…… （276）
第 20节　全球化世界的两极分化…… （285）
结语　大国的历史使命…… （299）
一、使命…… （300）
二、第二座长城…… （308）
三、秩序…… （311）
附录　另一种社会变迁…… （313）
一、推动人类思想进步的十大人物…… （314）
二、改变人类日常生活的十项科技发明…… （325）
三、影响人类传统生活的十件文化盛事…… （336）

前　　言

过去的千年，人类社会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与辉煌，也遭受了从未有过的灾难与屈辱，同时还不得不为这些进步背后潜生的种种不测之虞所担忧：几大区域性农业文明在全球性工业文明的撞击下纷纷解体——后者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体系开始以不可遏制的势头向整个世界拓展，并因此引发了深远的文化和地缘政治后果。压迫与被压迫、殖民与反抗、保守与变革就成为过去五百年西方与非西方社会之间冲突的主要矛盾；最终一种代表了新生产力、新文化以及被压迫民族最广泛利益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快速传播以及有效的组织和武装，就成为西方社会在扩张中没落、边缘国家在衰落中复兴的必然回应。解放与奴役、科学与民主、战争和革命随之在历史长河之中掀起千万重、足以摧毁与我们时代进步相悖的任何事物之巨浪。

社会在战争中变迁，文明在革命中演进。今天，经济全球化及各种相互依存越来越多地改变着全球每一个决策者的议事日程和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局部战争的继续与全球经济的扩张并行不悖，民族主义和跨国运动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同时发展，不同程度、不同空间的落后与大范围的进步相伴随。这使得人们在为世界文化的交融及整合、并可能出现普世文明进而带来永久的和平而庆幸的同时，又在为区域之间地缘政治和文化的冲突以及由此而来的国际格局演变的动荡与纷乱而不安。因为在这个世界日益“缩小”、各种行为体活动空间大为扩大、文化接触不断加强、政治信息迅速传递的时代，每一种矛盾的爆裂、每一次撞击的反应，都可能在遥远的薄弱处引起令整个世界惊栗的历史性回响。

正是在这种深深的忧虑或举手加额的欣慰之复杂心情中，一个崭新的世界在我们面前缓缓打开。

然而，无论在今天——一个旧的世界就要隐去的时代，还是在明天——一个新世纪即将到来的日子；也无论令社会变迁及文明演进的各种进步的或落后的因素如何变化，各种进化的或衰弱的进程如何加快，各种和平的或危险的联系如何密切，百年、千年乃至数千年人类文明社会不断演进的历史以及所建树的伟大成就，仍然足以令我们充满信心、鼓足勇气地思考过去并面对未来一切。在这种背景下，回顾和评价历史不但有益而且必要。而本书着眼于公元1000年后的历史，是因为这一段历史与我们这个时代的进步或落后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千年初尚有阿拉伯、中华、拜占庭等几个重要文明，最后惟有西欧文明继续上升成为影响世界进程的主流，究为何故？随后的五百年，近代西方文明为世界带来了伟大的人文精神和进步的科学以及一系列的现代化运动，也带来了殖民地式的奴役和不平等的国际秩序。然而，所有这些到了今天，却已成为一些古老文明可能复兴的重要动力。

每一种研究的范式都因为时空的背景局限而存在某种缺陷，角色、身份以及目标需要更是影响其结论的最大因素。这就迫使我们在有关历史以及国际政治的新的研究中，从更多的角度进行“整体研究”。

以文明为单位而不是以国家为单位地研究历史——这种比较文化形态学的出现与应用，可以看作是文化越来越深地影响国际政治和日常生活的一种反映。而地缘政治因素则是文明兴衰与更迭的重要动因之一，历史上的大国兴衰、力量中心的转移无不与地缘政治有密切关系。因此，作者将地缘政治学用于研究权力中心转移之动力的空间意义；文化形态学用于研究文明及国际体系变革之动力的时间意义。双向、互动的两者构成人类千年历史的哲学思考。本文认为，人类告别原始社会之后，陆续出现了几个

重要文明：埃及、印度、希腊、中华等文明板块。而人类文明在经过埃及为代表的第一代即原始文明、中国为代表的第二代即农业文明、西欧为代表的第三代即工业文明后，正在向第四代文明演进。而在新的文明形成之前将有一个多文化并存的、漫长的过渡时期，并且这一特征也将在国际秩序中凸现出来。本书要做的事，就是对过去的一千年历史，以文明为单位进行透析。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从原始社会到文明社会、从低级文明到高级文明的进化史；另一方面，在有限的篇幅内论述世界史，以文明为单位不失为简化历史以达到研究过去之路的最好办法。在作者看来，过去的一千年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部分：

一、衰微中的多文明世界（1000—1453）：是时，中华、阿拉伯、拜占庭等几个主要的、衰微的文明领导着世界并形成了不同的国际体系。这几大文明都处于后帝国时代：内部暴动频频、外部入侵不断。西欧近代文明则处于春秋时期：1）没有大一统帝国，虽然数十小国都致力恢复罗马帝国。政治上激烈竞争的局面，导致了西欧近代文明崛起的两个重要因素的形成——学术思想空气较为开放自由和军事技术、军事能力获得改进；2）受外部力量打击适度——来自亚洲草原的两支铁骑——蒙古军和奥斯曼军的重锤打击，但始终有拜占庭和东欧屏障。因此西方文明的勃兴可以说是地缘政治的产物——外界压力及内部变化，使其最终透过自身的地理特性找到了文化复兴和蓄积力量的动力——掌握全球制海权。

二、兴盛与衰落中的战争（1453—1648）：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西欧社会经济增长的关键，军事和经济强盛的要求又将政治制度改革推到历史前沿：1）物质力量的获取，首先是军事革命，因火器的改进和造船技术的提高而控制了海洋，并改变了亚欧大陆上文明的力量对比；其次是经济革命，此为支撑日益增长的军

事开支的需要。2）与军事革命并列的是思想文化上的觉醒，因此出现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前者使人文主义成为横贯现时代的一种进步力量，由此确立了科学的地位；后者即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极大推进作用。“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 建立之前的150年基本上是哈布斯堡王朝为争夺欧洲霸主地位与周边国家尤其是法国进行的一系列战争。

三、东西方力量对比变化（1648—1815）：欧洲战国时代的这种酷烈的政治、军事竞争，为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自由的土壤。正当大清帝国沉缅于农业社会的康乾盛世之时，工业革命结束了欧洲的“ 战国时代 ”，并改变了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对比。

四、独秀而衰的西方文化（1815—1917）：西方列强的势力触角已伸展到了全球的各个角落，掠夺领土与资源、输出资本和扩大国际贸易，而海陆交通运输和邮政通讯技术的大发展，使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密切。迫于生存的压力，中国等国在吸收了西方的技术、观念后，在西方的规则下开始了有限的变革。所有这些对意图肢解一切“ 非文明体系 ” 的西方来说，是一种挑战。

五、新旧文明交替时代（1917— ）：西方社会由于内部争战而开始衰落：工人阶级走上政治舞台，成为反对资产阶级的主力；边缘的殖民地区兴起此起彼伏的独立运动，瓦解了西方的殖民经济体系。社会主义运动，作为文明复兴的催化剂，使俄罗斯、中华文明出现了复苏和新生。

西方文明在扩张中已走向相对衰落，这一衰落有内部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非西方文明的堀起。西方国际体系的解体虽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不远的将来它可能退出全球主导地位变得地区化。其他文明的复兴则在现代化推进中不断革新、创新，进而可能恢复与现代化不悖的传统文化。

世纪之交，人们自然会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中国各大媒体大都作了此项工作。但《光明日报》国际部却提出以千年为尺度来写作的策划，算是一种独特尝试。为此，由朱宁同志经过了长时间构思和写作，《光明日报》主管编委何东平及国际部其他同志也作了大量的编辑工作，使其以《千年：社会变迁及文明演进》为题，于1999年11月9日—12月19日在《光明日报》分20个专题约七万字连载推出。以如此大的版面和篇幅连载文章，无论《光明日报》还是其他大报都是不多见的，足见报社领导对这一计划的高度重视和寄予的厚望。连载过程中，读者的电话、信件、传真、电邮自大江南北纷至沓来，其中有教授、学者、机关干部，也有大中学生。随后，史学刊物《寻根》也从2000年初开始，全年分六期进行连载。一些大的网站也作了转载，中央有关部门发文对此表示充分肯定。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评论道：“在人类即将告别20世纪之际，不少媒体站在历史的高度，通过多种形式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作了不少有思想性、艺术性的报道，也为新千年的到来增添了喜庆色彩。《光明日报》创办了《千年回顾与展望》专栏，从本千年初开始系统回顾对世界文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各个事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展望人类未来。……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在这样情况下，充实和完善这个系列专文，使其作为一部有价值的、使广大读者有所受益的著作出版，就变得势在必行。

本书以时间为序、分为20个专题来写，并考虑到读者的阅读兴趣，在每个专题中选出有意义的一天作为引子。也就是说，在作者看来，20个具有象征性的日日夜夜影响或改变了一千年的历史。本书在对千年历史的梳理中自然而又清晰地注意到，社会主义革命同资本主义革命一样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尤其是前者，它是对后者的一种继承和超越，它代表的是一种新文化和一种更为先进的生产力，也代表一度受奴役的广大非西方社会反

抗的需要以及劳动阶级最根本的利益。虽然一种新文明的孕育、生长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而历史也常常会出现停滞与反复，但是曙光已现。在斗争中，先进的势必前进，落后的必然消亡。此外，在我们看来，人类历史上，文明的冲突虽然存在，但从未成为国家或民族关系的主要因素，并且文明的冲突更多是纵向的即新旧文明之间，而不是横向即各文明之间的冲突——所有这些，可以使我们对今天被一些人关注的所谓文明冲突多一次历史纵深的认识和思考。本书无意成为一部历史学方面的著作，它仅仅着眼于同文明兴衰以及国际体系变迁有关的因素，同时希望找到现在一些霸权存在的、与历史息息相关的因子，从而使我们相信霸权的存在以及终结是历史的、从而不属于永恒。

由于出版时间紧，除朱宁同志外，我们又邀请了其他同志加盟，共同完成了本书最后一部分的撰著。其具体划分如下：

前言：穆方顺、朱宁；

概论、一、二、三、四（第1—14节）及结语：朱宁；

第五部分15、16、17节：薄洁萍；18节：孙晓靖、刘箴；19、20节：丁一凡；

附录部分是本书别有味道的一部分，它是作者对千年历史的一种透视和诠释。由柴野等撰写。

此外，在本书的雏作《千年：社会变迁与文明演进》的策划、连载以及完善成书的整个过程中，都得到了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王晨同志的支持与鼓励。回想起来，当初如果没有他的有力支持，此书今日之问世是不可想象的。这里，特向王晨同志表示感谢。

穆方顺　朱宁

概　论

文明与国际体系变革

历史的特点是：各种交替运动穿越了把亚欧分成东西方的想象界线。

——希罗多德

引言、霸权的终结？

今日人们身处的这个世界似乎是西方文明为主流的社会。这个极富扩张性的文明难道真的如一些西方学者所坚信的、有着与其他文明所不同的演进模式和生长动力吗？并且这一独特性就可以导致人类“历史的终结”？换言之，它作为人类文明最后的、最高的模式，足以解决人类现临或将临的所有问题，其他文明已无须发展、演进了？按照这一逻辑，所有的这类发展、演进有可能造成“文明的冲突”，由此而来的国际性、地区性动荡乃至战争则应由这些非西方社会负责？

基于上述想法，西方一些学者对未来国际秩序提出了各种可能演变的范式。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就在西方学界得到广泛赞同。福山认为：“我们正在……目睹这样的历史终结，即人类意识形态的演进的终结和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普及”。换言之，西方文明已或全面胜利，一切（包括其他文明）的演进都将终止。亨廷顿虽不赞成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却提出文明冲突论。他认为，恰恰相反，未来世界不但没有那么和谐，反而充满了冲突。冲突的性质不再是意识形态方面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所有这些西方学者们所犯的是一个常识性错误，即把西方历史当成世界史、把西方文明当成人类文明最高形式，以为历史到了今天便可使人类叹为观止了，所有的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新历史的事物，都被视为一种文化的异端、动荡与叛逆的根源。

文明之生长从外因来说是一系列地缘政治压力的结果；其内因则是由此对挑战作出了成功回应的结果——组织（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以及技术的创新和革新最终催生了文明的发育、生长和壮大。又由于失败的回应——失去创新和革新而堕入衰亡和解体。应当承认，历史上大国兴衰、力量转移无不与地缘政治有关，而世界每一次大格局的变动，都会引起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斗争。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体系发生了战后最深刻的历史性结构变化，世界进入两极格局向多极格局转变的过渡时期。旧的格局已被打破，新的结构尚未形成，各种政治力量处于重新分化组合的过程中，和平与发展是主流，但大国的霸权及由此而来局部的冲突却令全世界更加动荡不安。可以看出无论现在还是未来国家间冲突的根源自然是地缘政治性的，比如霸权战争，而很少由于文化因素引发——如果有的话也非水平方向而更多是垂直方向即新旧文化之间。

还有一个被西方不愿正视的事实是：雅尔塔体系崩溃了。社会变革有时首先是意识形态系统的变革，即一种旨在彻底涤清人们意识底层的顽固守旧观念的力量兴起，引发经济和政治系统的变化。近代强国的迅速崛起绝大多数都是从社会变革开始的：新的生产工具的使用、新的技术推广最终使生产力大幅提高。而开放的世界经济往往有助于将财富和技术集中起来，通过贸易、海外投资和技术转让等途径，财富和经济活动趋向由旧的中心区向新的中心区扩散，最后这些新的中心取代或超过旧的中心。惟有全新的社会结构所产生的前所未有的社会创造力，才能使其迅速影响到外部世界。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技术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吸引周边的落后国家。由于这个率先革命的国家向它们提供了关系结构作为国际秩序的范式，于是产生一种足以使这个地区聚合在一起的向心力。正是以上因素导致社会变迁、体系更迭以及新秩序诞生。

雅尔塔体系的终结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国际体系模式由帝国制向现代结构的转化，这是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化联系在一起的。三种相互关联的重要发展必然导致西方帝国体系的终结：在国际关系中作为配角的边缘国家的崛起；建立于现代科学技术之上的持续经济增长的出现；世界市场经济的形成。而雅尔塔体系的结束，并不简单地意味着某个超级大国的死亡，它意味着这种国际体系即由西方社会主导全球政治、经济进程的某种历史的结束。如果将在此之前的数百年历史理解成为西方的一元文明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国际秩序从欧洲半岛向全球扩张的过程，那么也有理由认定，这种体系的轰然崩溃，意味着一个建立在多元文明基础之上的多极格局的悄然形成。

西方近代文明发蒙之时，亚欧大陆有三个文明的中心，它们分别是中华、拜占庭、伊斯兰文明。这些文明已进入其后帝国时期，逐步丧失了创造和革新的欲望和能力。尽管在宋朝出现了发达的海上贸易、先进技术传布以及文化复兴等等。但是这些在局部显现的星火般的变化，并不具备产生使整个社会翻天覆地的改变的综合因素，故而燎原之势在明末、在晚清同样没有最终形成。具有革命性质的西方文明，却以其独特的扩张性，开辟了全球政治的新纪元。

西方社会在经过了旷日持久的衰落之后，究竟又是什么动力促成了它的变革和复兴？作为外因，文明的纵向影响即其他的高级的文明对它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而地缘政治因素，即来自亚欧大陆东部的游牧民族的挤压同样不能忽略。作为内因，主要是西方社会的创新和变革。欧洲社会内部早已发生了变化。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仍然是由于技术的改进和农耕制的改变——三圃制取代了二圃制，加上从中国传来的水磨及马用挽具的推广，农业生产率提高了近一倍。随后人口增长及随后有组织的市场和货币经济的扩张使产生了封建社会的那些基本要素发生了变化。劳动力

逐步流动起来，庄园经济逐步解体。货币在经济政治生活中越来越利于市场的进化。手工业者集中到城市，由为领主贵族和自家生活需要而生产，变成为市场而生产。政治上的多元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各方面的竞争推动了军事装备螺旋上升。军事革命的直接后果是对财源的更大需求，这又使得经济革命迫在眉睫。货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兵役免除税——用货币给付来代替劳动投入。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发展起来了，出现了民族君主国。这些大而新的政治统一体，为海外冒险事业调集人力、物力资源方面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技术革新即使还很有限，但已在整个地区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农业方法调整适应了新的环境——结果使庄园制度和封建制度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革。随后人口和商业一道扩张。

自欧洲社会崛起历经了五次大扩张，并贯穿在不同的阶段：第一次扩张是在其“春秋时期”，这一次扩张周期与十字军运动相吻合，大约在公元1000—1300年之间，随后是全面收缩；第二次扩张则是在“地理大发现”时代，起自于15世纪初葡萄牙人的探海，由哥伦布、达·伽马推向高潮，以欧洲“三十年战争”告终；第三次扩张则在其“战国时期”，高潮在18世纪末期，扩张的结果是欧洲内的两个世纪的混战，以拿破仑战争结束；第四次扩张则发生在其“帝国时期”，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其在19世纪末达到顶峰，并因此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五次扩张则在其“后帝国时期”，动力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以二次大战的巨大代价结束了西方的扩张。在五个世纪里，西方国际体系中先后出现了几个霸权、也涌现几个挑战者，比如葡萄牙霸权和西班牙的挑战，西班牙霸权与法国的挑战，荷兰霸权与英国的挑战，英国霸权与法国、德国的挑战，美国霸权与苏联的挑战，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酷烈的争霸战争。

最早建立并很快衰落的海上霸权是葡萄牙。葡萄牙人向海上发展一方面是出于对奥斯曼帝国压力的战略回应，一方面根据自己地理属性做出的：它的疆域不大且位于大西洋沿岸，三面为西班牙领土包围，这可以使葡萄牙避免将财力和精力投入欧洲战争中去。葡萄牙人认为，只要他们找到新航路，并控制这些贸易线，他们就能占据经济乃至军事上的优势，最终建立一个统一欧洲帝国。达·伽马建立了与亚洲的海上贸易后，葡萄牙人决心垄断新航线的贸易，不仅将其他欧洲人排除在外，也把数百年来一直在印度洋上经商的东方民族排除出去，其主要目标是控制香料贸易线。它占领了一些重要的包括马六甲海峡的战略要地：马六甲成为他们在亚洲最大的物资集散地和军事要塞。从而控制了跨越半个地球的商船航线，凭借这些贸易站和要塞构成的网络，葡萄牙人建立了一个海上亚洲殖民帝国。这一时期葡萄牙人扮演着亚欧贸易的中间商角色：将印尼的香料以及日本的白银和铜运到中国，又将中国的茶、丝绸、工艺品运到这两地，或者将亚洲的这些特产贩到欧洲。从美洲尤其是墨西哥和秘鲁源源不断而来的白银，使葡萄牙人有足够的资本与对白银绝对需求的亚洲国家进行贸易。然而，与亚洲的贸易在性质和结果上都不同于与美洲的贸易，成了使葡萄牙亚洲海上帝国衰落的原因之一。

葡萄牙人的成功刺激了西班牙人的海上扩张。根据“教皇子午线”，葡、西两国划分了在海外的殖民地。葡萄牙将亚洲和非洲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西班牙则几乎独占了美洲——到16世纪初这个由合并、联姻方式组成的几乎囊括整个欧洲的政治联合体，形成了马德里和维也纳两个政治中心，正如其帝国纹章上的黑色双头鹰：一个窥视东方，一个窥视西方。查理一世在

当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后，西班牙成为第一个拥有海外殖民地的帝国。所有这些，也得益于对奥斯曼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战争，因此促成了军事革命。军事革命理应带来经济变革——只有丰富的财政收入，才能支持军事的革命。但是西班牙并未出现经济结构、组织的重大变革，这是西班牙衰落的主要原因。手工业落后、以农业为主的西班牙，它的财政收入来源有三：一是羊主团交付的税金；二是低地国家和其他领地的款项；第三是新大陆的财富——两种收入源于外部说明它的经济大厦是建立在沙滩上。西班牙帝国对羊主团的保护，阻挠了土地所有权的发展，丧失了改进农业的动力。此外对羊主团征以重税，使其在国际市场丧失竞争力。第二项则因为尼德兰的离心力不断加剧而不稳定。来自美洲的黄金和白银，不但未给手工业的发展带来机遇反而使其衰落。

西班牙领土辽阔但未联成一片。它继承了一些领土的同时，也把地缘政治矛盾继承了过来，使自身长期陷入战争中。对外部，在巴尔干和东欧地区，西班牙与奥斯曼冲突不断，在北非与奥斯曼向西扩展中的海上势力长期对抗。在欧陆，西班牙王国的领土以北、东、南三面包围了法国，使法国与西班牙的战争长期化。而在反对西班牙问题上，法国与奥斯曼以及英国的联合，使西班牙在外交上受困。作为一个海陆兼具的国家，既要顾海军亦要照顾陆军，军事开支呈螺旋式上升，而缺乏经济的革命并且视以命脉的几项岁入的丧失，使西班牙最终无法支撑军事上的争霸。西班牙政体的垄断性及造成的政策失误，比如剥夺少数民族（先是犹太人，后是摩尔人）的财产，还使其丧失了基本的政府信誉。尼德兰北部出现的新教，促成了荷兰的独立，西班牙受到严重削弱。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的覆没，丧失了海权，西班牙就无法再作为一个大国存在了，“三十年战争”和“比利牛斯条约”，不过是其衰没的结果。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前的150年，欧洲基本是哈布斯堡王朝为霸主的一极化格局。哈布斯堡王朝为争夺欧洲霸权与周边国家尤其是法国进行了一系列战争，西班牙的衰落，促成了法国在欧陆的兴起。然而法国的兴起中就已孕含了衰落因子。法国王权在宗教战争后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王室税收权力的增长以及税收的增加又大大地支撑了军事的变革和对外的竞争力。法国人口约是西班牙的2倍、英国的4倍，自然资源较丰富。虽然在都市化、商业和金融方面比不上英国和意大利，它的农业水平却在欧洲较高，通常总有剩余产品。然而17世纪的法国农业仍保留着若干中世纪特征，这一特征限制了全国市场的发展，而由收益递减及阻挠有效调整和新技术创新的制度环境造成了法国农业的日益虚弱。劳动力和资本的流动也受到限制，法国经济因此未能显示长期稳定的增长。作为一个海陆兼具的国家，法国在战略上始终左右摇摆，不但军费开支得强作两半，其海军也不得不一分为二：因为法国沿海地区一部分面向地中海，一部分面向大西洋——海军无法集中对敌。这些限制了法国作为一个挑战者的发展。

西班牙衰落之后，法英之间的矛盾斗争成为欧洲社会的主要政治冲突。封建势力没落时的挣扎、资本主义势力兴起后的扩张，特别是资本原始积累、商业市场和殖民地的需求以及大国、强国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追逐成为矛盾的主要根源。西班牙、法国的兴衰意味着，最终的强国必然是一个能建立绝对海上霸权的国家，这个国家还因为身置欧陆之外而免遭四面围攻。在西班牙、法国之后，由荷兰、英国建立的全球海洋帝国的时机终于来临。

二

1648年西方社会进入其文明的“战国时期”，在其后的三百